

MODERN SOCIETY AND MAN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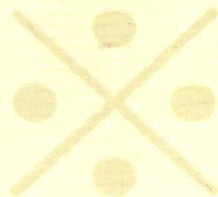
Philosophie des
Geldes

Georg Simmel

货币哲学

[德] G.齐美尔/著

许泽民/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MODERN SOCIETY AND MAN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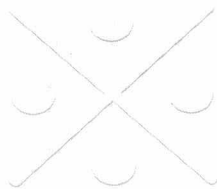
Georg Simmel

Philosophie des
Geldes

货币哲学

[德] G.齐美尔/著

许泽民/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货币哲学 / (德)齐美尔著;许泽民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 8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

ISBN 978 - 7 - 221 - 07810 - 0

I. 货... II. ①齐...②许... III. 货币 - 哲学
IV. F820 - 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5786 号

责任编辑:黄筑荣

装帧设计:曹琼德

货币哲学

[德]G. 齐美尔 著

许泽民 译

出版发行: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550001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贵阳德堡快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16. 960 × 660mm

印 张:35

字 数:56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221 - 07810 - 0

定 价:59.00 元

编者的话

大约五百年前,随着中世纪的结束和新大陆的发现,人类开始相继进入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之不同于“古代社会”和“原始社会”,不仅因为时间上更“近”,而且首先是人的生存方式与生活理念的更“新”。就后一方面而言,“现代社会”乃是欧洲人在最近四五百年间特别是最后一百多年来通过对世界的征服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形态,是一种把“理性主义”、“人的主体性”以及“世界为一客观实在”作为基本生活信念的生存方式。这种理念和方式是前所未有的。

现代社会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体现于物质、制度和思想观念诸层面。其中,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变化尤为触目:自动化的机器生产把人从沉重单调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石油、电力和原子能成为新的能源供给者;汽车、火车和飞机代替了过去简陋低效的运输工具;电子通讯(电话、电报、电视、传真等)不仅使人们易于获得信息,而且使遥远的世界近若比邻;农业机械的运用使过去分散的农业变成集约化的工业生产;化肥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生物工程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不仅能按人的需要培养出新的品种,而且使复制生命本身成为现实;现代物理学、天文学已把人们的认识推进到量子(夸克)结构和一百多亿光年的遥远星体;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广泛运用,更是在人类生存的各个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作为这一切的结果,人们的生活变得方便了、舒适了、安全了。至少从总体上来说是如此。

“福兮祸所伏”。现代社会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上虽然功不可没,但也同时造成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大机器生产和科层化的管理体系使人变成机器和制度的附属物;人口急剧增加,使本已紧张的物质资料生产更加紧张;与此同时则是自然资源的不断减少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贫富悬殊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在不断地加剧;战争和冲突依然存在,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旧的压迫和奴役形式消失了,新的又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金融风波使最隔离的地区也无法

免受其害；现代化过程中所滋生的急功近利和唯利是图倾向消解了传统的道德和人生的终极关怀……所有这些都使人在为现代社会的成就欢呼雀跃的同时又感到莫大的沮丧和困惑。

学术是存在的一面镜子。人与现代社会之关系以及人在其中的生存处境,包括他所取得的成功和所遇到的困难,必然会引起现代思想的关注与反思。西方学术也不例外。事实上,这种关注和反思还特别形成了现代西方学术尤其是人文学科研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观点之纷呈,学派之林立,实有使人目不暇接之感。其中虽难免片面与错误,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使中国读者了解西方一百多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了向正处于自身理论建构中的中国思想学术界提供可资借鉴的相关材料,我们编辑了这套“现代社会与人”译丛。“译丛”围绕现代社会与人这个主题,精选名家名著或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分批陆续出版。从1987年至今,“译丛”已推出三十余种,广涉心理学、社会生物学、哲学人类学、宗教哲学、伦理学、文化哲学、心智哲学等领域,是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唯一一套未曾中断过的“译丛”。“译丛”过去的成绩固然值得珍视,但还须“更上一层楼”。无论是选题的确立还是译文的质量,都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除了“译丛”编委会和出版社的努力外,尚需广大读者和学界同仁的支持、建议和批评。

哀我中华,命途多舛。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战舰和炮火,把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卷入了现代社会。在经过长时间的拒斥、犹豫、推就之后,中国终于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理念(远不完全)。正当她信心十足地奔赴现代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时候,现代化给西方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端似已尽显,现代西方的有识之士和后现代的思想家们已经早就在反省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了。在中国尚需赢获现代社会所有肯定性东西的情况下,中国人能从西方的成就与问题中学到些什么呢?在世界已开始由“现代”向“后现代”的嬗变中,正处在由前现代到现代之转折点上的中国人该如何来把握他们前进的航线呢?在全球已缩为“村落”、经济已一体化的今天,该如何调整我们的行为和观念并在这种调整中坚持那些为个人和人类所需的精神空间呢?要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易事。但我们相信,本“译丛”所列著作,与已翻译过来的其他西方学术著作一样,定能为回答上述问题多少提供一些启发和帮助。

“现代社会与人”译丛编委会

2000年6月25日

中译者序

1983年,当格奥尔格·齐美尔的一个社会学论文集^①终于得以再版的时候,德国当代著名的哲学、社会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在其后记中写道:“这套论文集断版60年后于今天再续,这件事未始不在表明齐美尔作为一位文化批评家的特异之处,表明他跟我们多么贴近,又离我们多么遥远。”然则,作为一位社会学家,作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术界人物,齐美尔的命途实在令人扼腕慨叹。

1858年3月1日,齐美尔出生于德国柏林市中心一个富裕的犹太裔商人之家,在7个孩子当中排行最小。据称,齐美尔一家是天主教徒,他的母亲是女性当中的凶悍强横者,她跟齐美尔之间的关系相当淡漠。还在齐美尔年纪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便去世。后来,齐美尔被他们家的一位朋友、一位音乐发行业主收养。1876年,齐美尔进入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学和哲学,自此开始了他跟该大学结下的令人遗憾、颇令历史有点尴尬的长达30多年的不解之缘。

在柏林大学学习的5年时间里,齐美尔很快就表现出出众的才华,同时也得到了这所著名学府的文化氛围的陶冶。那时,在柏林大学执教的都是当时德国著名的学者,比如历史学家莫姆森、特赖奇克、聚贝尔、德罗伊森,哲学家哈姆斯、策勒,语文与艺术史学家格林,人类学家拉扎鲁斯、斯泰因塔尔以及心理学家巴斯蒂安等等,他们都给齐美尔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当齐美尔于1881年取得博士学位的时候(他的学位

^① Georg Simmel, *Philosophische Kultur: über das Abenteuer, die Geschlechter, und die Krise der Moderne: Gesammelte Essays*《富于哲理的文化:冒险、家世及现代的危机论文集》(Berlin, 1983),初版于1911年,1923年出第3版后断版,于60年后再续。

论文是 *Darstellung und Beurteilungen von Kants verschiedenen Ansichten über das Wesen der Materie* ——“康德有关物质本性的观点辨异”),他已经是一位兴趣广泛、知识广博,从历史学到哲学、从心理学到其他社会科学多有涉猎的年轻学者。也许是由于学校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也许是由于对柏林有太多的留恋,跟当时典型的德国学人在读书或工作期间不断变换地点不同,齐美尔毕业以后似乎要决心在柏林大学建立一番事业,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1885年,他在柏林大学谋得了一个编外讲师(*Privatdozent*)的职位,也就是说,学校不付给他薪酬,他的收入必须从学生的听课费之中取得。他开设了多种课程,包括逻辑学、哲学史、伦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有关康德、叔本华、达尔文、尼采等著名人物的讲座,一个学期当中往往对社会学和形上学方面的诸多潮流进行考察和评价。据说,他的讲课在当时很有影响,不仅在学生当中、而且在知识精英之中都成为了一个重要学术事件。然而,尽管如此,齐美尔还是无法摆脱学术圈内边缘人和局外人的窘境。

1901年,当齐美尔43岁、在柏林大学当了16年编外讲师以后,学术当局终于同意授予他一个副教授(*Außerordentlicher Professor*)的荣誉性头衔,尽管对他的学术地位给予了一定承认,但仍然把他排除在正统学术机构及其活动之外,没有为他抹去正统学术圈的局外人的耻辱。可是,在这段时期内,齐美尔已经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不仅已经誉满德国,而且,他的名字还传到了欧洲其他国家和大洋彼岸的美国。他出版了6本书,70多篇论文,其中有一部分已被翻译成为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波兰语、俄语,受到了世界学术界的欢迎。但是,每当德国某所大学的高级职位出现空缺而齐美尔又提出申请的时候,他总是遭到拒绝,尽管他的申请受到诸如马克斯·韦伯这样的著名学者的支持和推荐。齐美尔受到学术同僚的这种对待并未使他让自己置身于学术活动之外。他积极参与首都的各种知识与文化活动,频繁地出席各种代表时代潮流的沙龙聚会和哲学、社会学界的会议,与韦伯、特尼厄斯一起共同创立了德国社会学学会,跟文化艺术界的一些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例如,他与当时德国的两位著名诗人赖纳·玛丽亚·里尔克和斯特芬·格奥尔格就过从甚密。他活跃于艺术家、批评家、资深记者和作家之间,居于不同知识阶层的交叉点上。耐人寻味的是,与一战之前德国大多数“编外讲师”和“副教授”的拮据生活适成对照,齐美尔相对宽裕和“潇洒”的生活,却大大地得益于他的监护人给他留下的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此外,他的夫人格特鲁德(他们结婚于1890年)也是一位享有自身声誉的哲学家,她曾用笔名玛丽-路易斯·恩肯多夫出版了一些有关宗教和性别差异方面的哲学著作。

她还把他们的家庭安排成了一个上流社会社交聚会的场所,为齐美尔的创作灵感提供了理想的氛围,为他对社会的观察和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地。对于自己在申请高级职位这件事上的一再受挫,齐美尔一定抱有太多的遗憾。但是,他对自己的现状也许是满足的,因为他得到了深受他尊敬的许多学术界杰出人士的友谊,马克斯·韦伯、海因里希·里克特、埃德蒙德·胡塞尔、阿道夫·冯·哈纳克等如此享有盛誉的世界级人物,都曾一再为他奔走呼号,要求承认他的学术地位。

齐美尔的许多学术同僚和长辈,尤其是一些二流角色,肯定对他的才华感到不安,深深地感受到了他的严重威胁。但是,在另一方面,他的学生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听众则深受其魅力的吸引和震撼,因为齐美尔不但才思敏捷,而且还是一位颇具表演天赋的演说者。跟他同时代、听过他讲课的许多人都留下了不少课堂记录,几乎都一致强调他在讲课过程中的创造性思维如汹涌的波涛,一泻千里。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的分析精辟入理。他的演讲激奋昂扬,动作生动有力。他双手在空中挥舞,时而紧握成拳,时而舒展成爪;时而如锋利的大刀在听众眼前上方一划而过,时而全身动作戛然而止,然后,在全场肃静之中,他的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势迸发,喷涌而出,使整个课堂为之一震。据报道,《歌德传》的作者埃米尔·路德维希曾经以通俗的手法这样描述齐美尔的演讲:“在讲课的时候,齐美尔就像技术高超的牙科医生那样洞察一切。他用亲自磨得锋利的微型手术探具直插牙根深处,小心翼翼地抓住牙脚的神经,然后把它拔出来。刹时,学生们一拥而上,围在手术台四周,争相察看蜷缩在探具尖端上的那一团东西。”后来居住在美国的西班牙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曾经在写信给威廉·詹姆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的时候说他“发现了一位编外讲师齐美尔博士,其演讲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当桑塔亚纳以这种笼统的方式谈及他的听课印象时,他要表达的难道不是与路德维希相同的感受?

颇有戏剧性、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齐美尔终于达到了他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目标之时,他的演讲机会也像其讲课期间常常表现出来的动作那样“戛然而止”了——不过,随之而来的,不是在任何意义上的“迸发”,而是沉寂,永远的寂灭。1914年,他在当时德国的一所边远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谋得了一个全职教授的职位,但当他正式履新就任的时候,那已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了。随着战争的到来,大多数大学的教室都被改成了战时医院,一切教学活动都已基本停止。这对于齐美尔而言,演讲的机会也就永远丧失,因为在战争就要结束的时候,1918年9月28日,格奥尔格·齐美尔因肝癌不治而逝世,终年60岁。即便在其晚年,齐美尔寻求德国学术界

承认的道路也还是那么艰难曲折,因为在1915年,当海德堡大学因威廉·温德尔班德和埃米尔·拉斯克两位教授逝世而留下空缺、齐美尔再次申请竞争的时候,他又一次遭到了挫败。此外,顺便一提,饶有意味的是,齐美尔对待战争的态度与其“异乡人”的身份(他是犹太裔)恰成鲜明的对照,也与其在学术上一向冷静、理性的超脱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战争开始以后,他投身于狂热的战争宣传之中,在一篇文章里,他写道:我热爱德国,因此,我希望它长存——让一切具有“客观”合理性证明的东西,让那些在文化、伦理、历史以及天知道的其他方面的这种意志见鬼去吧。所以,有人认为,齐美尔晚年的神经是出了问题了。连他的青年朋友恩斯特·布洛赫(瑞士作曲家)也对他说:你一辈子都避免做出决定——得第三方渔翁之利——而现在,你却在战壕里找到了绝对。

在专业领域,齐美尔算得上是一位多产的作者,一生著述甚丰。他在世之时发表在各种报纸、杂志上的文章有200多篇,还有数篇在他逝世以后才发表。他的主要著作有十多部,另外还有五六部不那么重要的小册子。这些著作包括:《论社会的分化》(Über soziale Differenzierung, 1890)、《史哲学的问题》(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1892)、《伦理科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Moralwissenschaft, 1892-3)、《货币哲学》(Philosophie des Geldes, 1900)、《叔本华与尼采》(Schopenhauer und Nietzsche, 1907)、《社会学:社会化形式的探讨》(Soziologi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Formen der Vergesellschaftung, 1908)、《哲学的主要问题》(Hauptprobleme der Philosophie, 1910)、《富于哲理的文化》(Philosophische Kultur, 1911)、《宗教》(Die Religion, 1912)、《战争与理智的抉择》(Der Krieg und die geistigen Entscheidungen, 1917)、《社会学的基本问题》(Grundfragen der Soziologie, 1917)、《生活的展示》(Lebensanschauung, 1918),以及关于歌德(1913)、伦巴朗特(1916)的文学艺术批评小册子。有些西方作者认为,在20世纪前期,齐美尔在社会学方面的影响仅次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迪尔凯姆)。

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初版于1900年,1907年做了增补以后出第2版,此后曾多次再版(1977年出第7版),并于1989年被收入《齐美尔全集》,成为了《全集》的第6卷,本中文版即译自其增补版。在本书中,齐美尔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试图通过货币这单独一个例证而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把生活最表层的现象与生活内部最底层的深邃之流和历史潮流联系起来,“在历史唯物主义底下构建一个基础,以便在保持经济生活构成思想文化的起因这一阐释价值的同时,经济形态本身同样被视为是深一层的价值判断以及心理的、甚至形上的前提条件流变造成的结果”(见“再版前

言”),并张扬了他所坚持的相对主义世界观。可以说,齐美尔在大学课堂上讲课时那种渊博的学识、雄辩的说服力和条分缕析、细致入微的辨别能力在本书中得到了再现。当然,从《货币哲学》全书的篇章布局来看,齐美尔的行文未免显得冗长、呆板,甚至有可能使读者觉得迷惘,因为书中除了各章的标题以外并无其他小标题(本中文版正文内的分节小标题是译者加插进去的),书前的“目录”也只有各章下面的分节提要,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分节“目录”。而且,书中的段落动辄占两三页的篇幅,句子的结构也比较繁复,读者读起来很可能觉得吃力。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来,这正好说明齐美尔汹涌如流的思辨、缜密的思维和把握全局的能力,因为全书的论述都是围绕货币这个历史现象展开的,或者以货币为目标来构建理论基础,或者把货币与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联系起来,谈论的都是一个大问题。全书前后分成两篇,探讨的也是相同的主题,只是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展开而已。

在本书翻译期间,译者参考了手头现有的一些译本,深受启发,尤其是英国学者 David Frisby 先生翻译的英译本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本中译本(蓝本为德文《齐美尔全集》第6卷, Frisby 及 Klaus Christian Köhnke 合编)仿照了他在英译本中对原书布局所做的处理,即在译文的正文之中加插了分节小标题。本来,书前“目录”各小节下的“提要”和书中各个小节本身都分别是统一的整体,如果把这些“提要”拆分开来强行加插在书中的章节里面,必定会干扰各章节的统一性,有可能误导读者(否则,齐美尔本身是不会不如此办的)。但是,译者还是这样做了,一来是因为考虑到一般阅读习惯(齐美尔的“小节”实在太长),二来也是因为先例可循;只是在此只得提请读者注意了。为此,本译者也对 Frisby 先生,还有其他译本的译者,深表谢意。

本书的翻译旷延多载,几经波折。但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得到了陈维政、黄筑荣二先生的热诚鼓励和鼎力相助,他们提出的建议和提供的资料使译者获益匪浅。此外,李洁玲女士也为译者提供了重要资料。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许泽民

2006年12月

再版前言

9

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有两个界限。进入边界地带,思维的流向就越过“精密”,转而呈现哲学形态。认知的一般前提,就像各个特定领域里的公理一样,将其描述和证明从其所在的领域转移到一门更具基础性的学科中进行。这样一门学科具有无限的疆界,其宗旨在于不设前提条件的思考。如此宗旨实在为各科学学科所无法接受,因为没有证据,也就是说没有实质性和方法论性质的前提,这些学科就寸步难行。当哲学描述与审查这些前提的时候,它自身也无法把它们完全扬弃。到了这一步,哲学也就抵达了认知的一时终点。只不过每到这样的时刻,我们心中就总是涌现出神圣的使命感,使我们义无反顾地诉求于不可证明的东西。当然,鉴于哲学一直都在向前发展,而其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正是可证明的东西,所以,认知的终点却也绝不是明确地固定不变的。如果哲学研究领域的起始标志因此可以说在于精密研究领域的下限,那么,这一标志也在于其上限,即在于实证性知识的总是零碎的内容,透过概念的锁定而添加到一幅世界画图里并与生活的整体联系起来的地方。如果说诸科学学科的历史确实揭示,哲学的认知方式是原始的方式,哲学仅仅是用一般概念对现象做大致地考量,那么,这一临时性做法在我们面对某些迄今既无法确切地解答、又无法置之不理的问题之时却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属于精神生活当中的价值判断和最普遍的关系方面的问题,情形更是如此。的确,甚至臻于完善的经验也许都难以取代哲学,以作为对实在的阐释、描绘以及有个性、有选择的凸显,正如对现象的机械复制的完善并未使造型艺术成为多余一样。

从以上对哲学的定位所做的一般探讨之中,哲学对其特有的对象进行研究的权利引申出来了。若要建立一门关于货币的哲学,那么,这门哲学只能居于货币经济科学

10

的两个界限以外：一方面，这门哲学能够描述给货币赋予意义和实际地位的前提条件，而这些条件是存在于各种心态、社会关系、实在与价值的逻辑结构之中的。这不是货币起源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属于历史学，而不属于哲学。而且，无论我们多么重视从一个现象的历史演变之中获得的对这个现象的理解，其演变结果的内在意义和重要性，却往往在于种种概念、心理、伦理性质的关系。这些关系都不具时间性，而是纯粹客观的。它们虽然被历史的力量实现了，但是并没有被这些偶然的力量消耗殆尽。比如，法律、宗教或知识的意义、尊严、内容，就完全超然于它们在历史上如何实现这个问题之外。因此，本书第一部分阐述使货币演化出来并支撑着货币的本性和存在意义的前提条件。

11 这样，当我试图从作为货币的前提条件的价值感、对事物的实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阐明货币的概念和结构以后，在本书的第二部分“综合篇”里，我将探究货币这个历史现象对内心世界的影响：对个人生活情感、对个人命运的相互关系、对一般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方面，探讨货币就是探讨各种关系，这些关系从其本性上看，需要以精密、特定的方式才能进行研究，但是，从目前的知识状况看来却又无法以如此方式进行，因此这些关系只得按照哲学的类型，通过一般的、大致的考量，用抽象的概念关系表示特定事件进程的方式来处理。另一方面，探讨货币又是一个关于货币的心理起因的问题。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对实情的猜想性解释，一种永远无法完全摆脱个人色彩的艺术重构。所以，货币原理跟内心生活的发展和价值判断这样结合而成的分支领域，远远居于货币经济科学的后面，而本书第一部分的探讨领域则居于其前面。本书的第一部分意在从一般生活条件和关系之中厘清货币的本性，第二部分则反过来，从货币的效用之中厘清一般生活条件和关系的性质与形态。

在这一探讨的字里行间，没有任何东西立意在于经济学。这就是说，估价与购物，交换与交换手段，生产方式与财富的价值，这些被经济学从一个角度出发加以探讨的现象，在本书之中却被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来加以探讨。只是由于这些现象受到经济学关注的那些方面，在实践上最使人感兴趣，得到了最透彻的调查研究，并能够以最精确的方式表述出来，它们才被无条件地视为是“经济学事实”，这一看法也才有了似乎合理的根据。但是，正如一个宗教创始人的出现，绝不单纯是一个宗教现象，而是还可以在心理学、或许甚至可以在病理学、普通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范畴下进行研究；或者，正如一首诗并不单纯是一个文学史实，而且还是一个美学、语文、传记事实；又或者，正如一门学科毕竟是一种劳动分工，其观点无论如何也穷尽不了一个实在事件的全部——

同样,两个人交换产品这一事实,也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事实,因为诸如一个现象的内涵被经济学为它描绘的画图穷尽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不存在。毋宁说,每一次交换都完全可以同样正当地被视为是一个心理学事实,或者被视为是道德史的一个事实,甚至美学事实。而且,即使被视为是经济学事实,它也并不因此陷入华山一条路的境地;相反,甚至在经济学的形态下,产品交换这一事实,也可以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可以用非经济学概念和非经济学事实来检验它的前提条件,以及它给非经济价值和非经济关系造成的后果。

在本书探讨的问题领域里,货币只是用来表现各种关系的一种手段、一件材料,或者一个例证。构成这些关系的一方的,是最表层、最实际的偶然现象,另一方则是此在^①之最具有想像性的潜在力量,个人生活与历史的最深邃的潮流。所有这一切的意义和目的,仅仅在于从经济事件的表层推导出一条对人类一切事务具有决定性价值和意义的指导原则。一个抽象哲学体系的建构跟特定现象、尤其是跟实践中的此在,是保持着一段距离的,也就是说,这一建构其实仅仅是假定把这些现象从孤立与非精神性状态、甚至从其初看之下拂逆人意的状态之中拯救出来。不过,在本书之中,这一拯救行动仅仅通过一个范例即货币来完成。一个像货币这样的范例,不仅表现了纯经济技术的超然性,而且,货币本身就可以说是超然之物,因为货币的全部目的意义并不在于其自身,而是在于其变换成为其他价值。因此,当看起来最表层、最缺乏实质的东西跟生活的内在实质之间的对立在这点上紧张到极端的时候,如果这一特定事物不仅既主动、又被动地与精神世界的整个领域交织在一起,而且还表明,它本身就是这一领域的基本活动形态的标志,那么,这一对立就必须以最有效的方式来进行调解。因此,本探讨的内在一致性,并不在于只张扬了一个认识内容及其逐步形成的证据,而在于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中发现其整体意义的阐释可能性。艺术相对于哲学的非凡优点在于,艺术的每一次张扬都为自己单独设定一个范围得到严格界定的问题:一个人,一道风景,一种情调。而且这些东西每次引申至一般,每增加一次对世界的大手笔探索,都让人觉得像是得到了一笔横财,一种恩赐,仿佛是一场受之有愧的福泽。相比之下,哲学——其探讨的问题同样是存在的全部——通常都达不到其为自身规定的这种程度,它的实际贡献比它看似应该做到的要少。为此,本书则反过来,力图把探讨的问题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从局部见全体,以求达到最大限度的

12

13

^① Dasein,也译“存在”、“具体存在”。(本书以下脚注凡未标明注者的均为中译注。又中译本边码即为英译本页码,特此说明。——译者)

普适性,使这个问题得到公允得体的处理。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这一基本意图可以表述如下:本书试图在历史唯物主义底下构建一个基础,以便在保持经济生活构成思想文化的起因这一阐释价值的同时,经济形态本身同样被视为是深一层的价值判断以及心理的、甚至形上的前提条件流变造成的结果。对于认知实践而言,这一阐释必定以无限互推的方式向纵深演进:用经济形态对观念形态所做的每一层阐释,必然随即引发一个要求,即这一层经济形态本身又应该从深一层的观念形态上来理解,而为了这些更深层的东西,又必须全面探讨这一层次的整个经济基础,如此反复以至无穷。当在概念上互相对立的认知原则如此交替推演和相互交织的时候,在我们的认知看来似乎是无影无形但还是以其关联为基础的事物之统一性,对于我们而言就变得切实而生动了。

倘若在此勾勒的意图和方法不能服务于内容多种多样的基本哲学信念,那么,它们在原则上就不能声称具有任何正当性。生活细节与生活的表层现象,是可以跟其最深层、最基本的活动联系起来的,而根据其总体意义对它们所做的阐释,既可以是理想主义的、也可以是现实主义的,既可以是唯理智论的、也可以是唯意志论的,既可以是绝对主义的,也可以是相对主义的对存在的阐释。本书随后所做的探讨,是在断然排除了一幅对立画图的情况下,以上述世界画图之一为基础进行的。我以为,这幅画图是当代知识内容和感情流向的最贴切的表达。这就使我的这幅画图在最坏的情况下起码可以扮演一个典型范例的角色,即使其不符合客观实情,它也一定会在未来作为一种正确的探讨方法显现出其方法论意义。

14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一新版本所做的改动,并不涉及本书的基本主旨。然而,我希望,通过新实例、新讨论,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基础的进一步深化,本书的主旨会更加易于理解和接受。

目 录

001

001

003

中译者序
再版前言

分 析 篇
第 一 章

一

价值与货币

实在与价值是两个互相独立的范畴,我们的表象就是以此为内容而形成世界的图像;客观价值的心理事实;实践中的客体性作为全部主观价值的规范化或保证;经济价值作为主观价值的客体化,其原因在于直接享受的主体与享受客体之间拉开的距离;经济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类似性;经济作为一种(通过辛劳、放弃、牺牲)建立距离、同时又征服这一距离的活动 / 003

二

交换作为扬弃物的纯主观价值意义的起因;在交换中,事物通过对方来表达自己的价值;一个物品与另一个物品相交换而使物品的价值客观化;交换作为生活形态和作为经济价值的前提,作为首要经济事实;效用理论与稀缺性理论解析;价值与价格;社会制定的价格作为客观调节价格的预备阶段 / 026

三

相对主义世界观的经济价值体系;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相对主义世界观的例证;无穷无尽的证据构建和辗转复折的相互求证;真实之客观性与价值之客观性作为各种主观因素之间的关系;货币作为交换关系的自主表达,这一关系使需求

第二章

一

客体转化成为经济客体并建立起事物的可替代性;从其价值稳定性、发展和客观性方面看货币的本性;货币作为一般存在形式的物化,事物据此而从其相互关系中获得各自的意义 / 053

二

货币的实体价值

为了履行衡量价值的功能,货币的内在价值看似不可或缺;衡量的问题种种;有效货币量;货币的内在价值构想的发展把单个商品与单一货币量之间的直接相等换算成为单个商品跟当前有效商品总量之比与单一货币量跟当前有效货币总量之比相等而批驳货币内在价值论;这两个分数之分母的潜意识性;货币的功能价值独立于其全部实体价值的逻辑可能性;货币最初具有充分价值的必要性;货币超越这一阶段的纯符号性等价构想的发展 / 088

放弃货币实体的非货币性用途;反对符号货币的第一个理由:使货币的内在价值成为多余的货币-商品关系无法准确地确定,货币的内在价值可以作为这一欠缺的补充;反对符号货币的第二个理由:符号货币的供应具有无限增加的可能性,货币相对论者将无视货币供应量的绝对高限而引发种种错误;货币的拥有货币从实体意义向相对主义意义的不可能充分实现的发展作为一般行为的例证,以及现实与纯概念的相互掣肘 / 112

- 三 货币从实体性向功能性发展的历程及社会的制约;社会互动种种及其结晶成为特定形态;货币政策;货币的功能;社会互动与交换关系;经济区域的大小、分散与集中程度对货币之实体特性的意义;货币向功能性转变及其各别的功能:促进贸易、稳定价值尺度、动员与集中价值;货币日益消退的实体意义;货币日趋上升的价值意义 / 130

第三章

货币在目的链中

172

一

目的性行为作为主客体之间的意识互动;目的考量链的不同长度;工具作为加强型手段;货币作为工具的最纯粹的例证;货币因其具有无限的可能用途而使其价值得到提高;财富的无形增值;同一货币量作为一大笔和一小笔财产之一部分的差别;货币的纯手段属性使货币有可能成为难以融合到社会中去的人们的专属领地 / 172

二

手段发展成为目的的心理历程;货币作为手段发展成为目的的最极端例子;货币作为目的的角色随时代的文化趋势而定;货币的目的论地位及其心理后果;贪婪与吝啬;挥霍;苦行式贫困;现代犬儒主义;乐极生厌 / 200

三

货币的量作为货币的质;不同风险量的主观差别;一个普遍现象:量变的因造成不同质的果;经济识阈;经济刺激